

# 20 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

胡宝华 编著

中华书局

## 序 言

〔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砺波护

自7世纪遣隋使、遣唐使以来,到19世纪末,中国一直作为日本的憧憬和楷模。当时东亚的广大地区都属于汉字文化圈。如今,这个文化圈只有中国和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已经不再使用汉字。日本从1995年开始,每年的12月12日在位于京都市东山区的著名世界遗产清水寺举办“今年的汉字”发布活动。主办方是总部设在京都的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这个机构每年都要向民众征集问卷,答卷者选择一个适当的汉字来表现当年的社会态势。这项活动目前已成为年末的一个社会关注景点。2011年对于日本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日本国民在战胜特大地震、海啸、核泄漏以及台风造成的各种严重灾害过程中,深深感悟到人与人、人与社会、国与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重要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2011年底,根据市民投票的结果,最终选用了汉字“绊”作为这一年的象征性文字<sup>①</sup>。胡宝华教授的力作《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是一部关于上个世纪初期以来日本出版发行的具有代表意义的中国史学著作解题书目,这部著作恰好具有像“绊”字一样的纽带功能,是一项将中日两国学术界联系到一起的学术成果。

自从1960年春,我在京都大学提交毕业论文《关于唐宋变革与使职》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一直在研究隋唐时代的中国历史。借这个机会,我想陈述一下尊敬的隋唐史研究前辈唐长孺先生和张广达、张泽咸两位先生对日本的中国史学研究所给予的评价。

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日本和中国尚未邦交,1972年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

---

① 日语“绊”的含义有几种,这里表现的是“纽带、联接”之意。

系。此后数年,历经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日中间的学术交流终于提到了正常的议事日程。1980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设置了外国人客员教授的新职位,最初受到邀请的是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关于这次邀请的原委,在拙文《唐长孺先生在京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唐长孺教授逝世十周年专辑,2004年)中有详细叙述。唐先生在洛中(京都),每天都要阅览日本学者的著作,对于重要的论文,出于个人以及学生的需要,全部复印带回了国内。唐先生对日本学界所给予的深切关注,在诞辰百年上梓的《唐长孺文集》8册(中华书局,2011年)中,随处都可以感觉到。

唐长孺先生访日后的第二十五年,接受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同样待遇邀请的是来自巴黎的张广达先生。张先生这次访日回国后,邮寄送给我一套他的文集(《张广达文集》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在第一册《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的“自述”中,收录了《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一文。这是一篇原载于《学林春秋三编》上(朝华出版社,1999年)的自传文章。文中,张先生回顾了自己1978年47岁开始在北京大学正式走上讲台,讲授中国通史和隋唐至两宋历史的经历。他说:

就是这样,年近半百,已成二毛的我,终于选择了隋唐、中亚为研究对象。受陈寅恪先生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关系说的启示,我将隋唐与中亚史结合在一起;受内藤虎次郎的中国近代始自唐宋之际说和堀敏一的中国各地可能分头发展的最后一次机会是五代十国时期说的影响,我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晚唐五代。

在该书的“学术史”部分,在与王国维有关的两篇文章后,收录了《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一文,这是原载于《唐研究》第11卷“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卷首、张先生的一篇大作。

北京大学刘俊文教授主编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10卷,19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译丛挑选了20世纪代表日本中国史研究水平的部分论文,出版后受到了中国学界的极大欢迎。除了第一卷《通论》收录的是宫崎市定的著作《东洋的近世》以外,其他全部属于学术论文。针对第四卷收录有13人19篇论文的《六朝隋唐》,张泽咸先生很快就在《书品》1993年第一期发表了书评(此文收载于氏著《晋唐史论集》,中华书局,2008年)。张先生在文章中首先详细介绍了宫川尚志《六朝时的村》、滨口重国《关于隋代乡官之废止》、砺波护《唐代县尉》三篇。张先生对这三篇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上述有关村、乡官、县尉三文,都是涉及州县以下行政制度及官制的重要课题。日本学者选题精细,论证深入,是这一学术领域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通读十九篇论文,我深感诸位学者的行文各有特色,他

们或治学态度谨严,措词一字不苟;或高度自律,勇于修正自己的失误。”对照上述三位先生的评价,我可以自信的说,在隋唐史学的领域,日本的学术研究确实作出了非常可观的贡献。实际上,其他时代领域的研究也是如此。

《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是一部编年体的解题书目。同样采用编年体例,南开大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杨翼骧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先秦至五代,1987年),这是我非常爱用的一部著作。

本书著者胡宝华教授是已故唐史专家胡如雷先生的次子,1954年生于上海。“文革”期间的1969年北京中学毕业后去内蒙古包头的兵团工厂做工,经过10年的磨练,“文革”结束后走进了大学。1985年陕西师大唐史研究所硕士毕业,1988年12月赴日留学京都大学,在日本潜心于唐史研究的12年中,1996年提交了博士论文《唐代监察制度研究》,并通过了由我担任论文审查委员会主查的答辩,获得博士学位,2000年9月回到南开大学历史系执教。在由我作序、胡宝华著《百年の面影——中国知識人の生きた二十世紀》(日本角川选书,2001年)一书中,最后的两章记述了他前半生的经历。

最后还想提到的一点是,《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没有收录工具书方面的成果,因此,这里想介绍一部2006年名古屋大学出版会出版的砺波护、岸本美绪、杉山正明主编《中国历史研究入门》,希望它能得到中国史学界的关注与参考。

2011年 师走(腊月)

# 目 录

序 言 .....	砺波护	1
前 言 .....		1
凡 例 .....		1
编年目录 .....		1
著作索引 .....		611
著者索引 .....		633
后 记 .....		661

## 编年目录

1904 年 .....	1
1905 年 .....	2
1907 年 .....	4
1911 年 .....	5
1912 年 .....	6
1914 年 .....	8
1915 年 .....	11
1917 年 .....	12
1925 年 .....	13
1926 年 .....	15
1927 年 .....	18
1928 年 .....	20
1929 年 .....	22
1930 年 .....	23
1931 年 .....	26
1933 年 .....	29
1934 年 .....	33
1935 年 .....	35
1936 年 .....	37
1937 年 .....	38
1938 年 .....	41
1939 年 .....	44
1940 年 .....	47
1941 年 .....	51
1942 年 .....	54
1943 年 .....	57
1944 年 .....	64
1945 年 .....	67

1946 年	68
1948 年	69
1949 年	72
1950 年	74
1951 年	78
1952 年	82
1953 年	85
1954 年	91
1955 年	95
1956 年	97
1957 年	98
1958 年	102
1959 年	105
1960 年	107
1961 年	113
1962 年	119
1963 年	122
1964 年	130
1965 年	136
1966 年	143
1967 年	148
1968 年	154
1969 年	161
1970 年	167
1971 年	178
1972 年	184
1973 年	192
1974 年	197
1975 年	204
1976 年	214
1977 年	221
1978 年	228
1979 年	235

1980年	244
1981年	268
1982年	271
1983年	281
1984年	293
1985年	305
1986年	315
1987年	326
1988年	337
1989年	351
1990年	362
1991年	372
1992年	381
1993年	404
1994年	412
1995年	418
1996年	429
1997年	442
1998年	457
1999年	470
2000年	485
2001年	497
2002年	507
2003年	525
2004年	539
2005年	549
2006年	568
2007年	581
2008年	591
2009年	601
2010年	608





# 前 言

## 一 缘起

日本中国史学界的 20 世纪是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纪,日本学者在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内藤史学(也称‘内藤假说’)”、“白鸟史学”、“津田史观”、“六朝豪族共同体论”、“地域社会论”这些各具特色的历史研究成果,给日本史学界注入了太多的刺激与活力,几代蜚声海内外史坛的学术名流脱颖而出。著名的京都学派、东京学派就是在围绕其中一些理论观念与研究观点的争论中逐渐形成的。双方学者在激烈认真的学术争论中,先后出版了一批质量上乘、影响颇深的学术著作,将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推到了 20 世纪的巅峰时期。

今天,虽然 20 世纪已经从历史纪年上走过,但是上世纪的学术生命并没有因此完结,一些著名的命题的学术影响依然存在,对新世纪的历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发作用。正如张广达先生所说:“古往今来,很多假说或学说的寿命难能长久。内藤的唐宋变革说则不然,作为中国近代史学论域中提出的最早的一种假说,将近百年来,仍在服役,被人经常引用;作为富有宗旨的学说,他在今天依然带动着学术研究。”<sup>①</sup>可见,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过去一百年的学术成果进行一些必要的梳理,承上启下是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最初萌发将上个世纪日本学者史学著作整理介绍给国内学人的想法,是我在 20 世纪末留学归国后,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研究生讲授“20 世纪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课程中逐渐形成的。当时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国内史学界对日本中国史研究成果缺乏整体的了解。1993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刘俊文主编的《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著作选译》10 卷,为我们了解 20 世纪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窗口。近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海外汉学的系列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sup>①</sup> 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载于《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相继推出日本名著译丛的计划,这些举措无疑为促进中日学术交流发挥了积极地作用。但是,这些翻译的著作毕竟只是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几部学术代表作,它仍然难以让中国学者通观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全貌。特别是每年研究生在选题和撰写学位论文时,对于许多作为研究史上应该参考和了解的国外重要成果几乎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甚至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也常听到一些评委在不甚了解国外研究动态的前提下即对某课题给予“补白之功”的赞许。类似这样的研究,不仅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重复性劳动,而且也很难与国际学术接轨。鉴于这样的考虑,我一直在想从目录学的角度,将上个世纪日本学者主要代表著作的要目编辑成书,介绍给国内的同行。2008年在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砺波护先生的大力关注下,我获得了一年访问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宝贵机会,这部工具书的编纂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

以下,为了方便读者了解上个世纪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基本发展脉络及其学术传承,笔者试对日本各主要大学与中国史学相关的课程设置、教授阵容做一粗略的陈述。

## 二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发展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是随着明治时代日本大学东洋史学的设置与发展而繁荣起来的。日本的东洋史学概念,最初主要是指日本史以外、以中国史为中心的东亚史;其后逐渐扩大到塞外史、中亚史和中西交涉史乃至亚洲(日本史除外)的全部。日本最早的国立大学是建立于明治十年(1877)的东京大学,1886改称帝国大学。明治时期日本的世界史教育始终是以西洋史为中心展开的。明治二十七年(1894)那珂通世首先提倡在中等教育课程中分别开设西洋史和东洋史。同年日本的中学开始设置了中国历史,其中包括突厥、女真、蒙古等民族史方面的内容。那珂通世在日本享有盛名的传世之作《中国通史》就是为中学历史课程而编写的。1897年东京帝国大学汉文科设置了“中国历史”的选修科目,由那珂通世讲师和林泰辅副教授担任。但是林泰辅的讲义内容受到了当时以藤田丰八为首的学生批判与排斥。藤田等人认为林泰辅的学问陈旧,他们要求的任课教师不是讲汉学而是要通晓东洋史学。<sup>①</sup>当年,林泰辅辞职后,市村瓚次郎继任副教授。1904年,东京帝大文学部设置了中国史学科,市村瓚次郎和白鸟库吉担任教授。1909年前后中国史学科改

<sup>①</sup> 岸本美绪编《“帝国”日本の学知》第三卷《东洋学的磁场》;第一章:日本的“东洋学”形成与构图(中见立夫撰);第29页。岩波书店2006年。

名为东洋史学科,并开始实行二讲座制度。市村主讲中国各断代史,白鸟主讲蒙古史和西域史。在他们执教东京帝大的二十余年间,不仅为东京帝大的东洋史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且培养出一批著名学者。其中包括藤田丰八、中山久二郎、箭内互、池内宏、加藤繁、原田淑人、和田清、桑原隲藏、羽田亨、桥本增吉、清水泰次、石田幹之助等。此后,这批学者为日本各大学的东洋史教育与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史、中亚史、边疆史、民族史及中西交通史的各个研究领域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东京帝国大学一枝独秀的局面形成,日本政界也成为东京帝大毕业生施展才华的重要舞台,当时日本政府的历届总理及其各重要部门的官僚绝大多数毕业于东京帝大法学部,拜官主义在东京帝大广为流行。明治二十五年(1892),当时的帝国议会议长谷川泰等 32 位议员提案,建议在关西地区再建立一所帝国大学。他们认为东京帝国大学是当时日本唯一的帝国大学,创立以来因为没有竞争对手,无论是教员还是学生都出现了固步自封、骄傲自大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大学学术的发展,也影响了日本帝国大学的形象。为了激发学问创新和提高教育质量,有必要在西京(京都)建立第二所帝国大学,形成一个能够与东京帝大匹敌的竞争对手。<sup>①</sup>同年十月,在京都召开的关西地方教育家大会上,时任帝国博物馆馆长的九鬼隆一(京都帝国大学条例起草者)指出:建立在京都的大学不仅不能逊色于欧洲诸大学,还应该担负参与世界文化的责任,成为东洋学的主盟者。<sup>②</sup>这个发言,实际上为未来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学的位置及其发展方向奠定了基调。在长谷川泰等人提案的五年后,明治三十年(1897),京都帝国大学应运而生。

京都帝大建立后,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是这所大学始终如一的办学方针。针对东京帝大的文科设置,1906 年京都帝大设置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中国学”,它包括中国哲学、东洋史学、中国文学三个学科。特别在“东洋史学”领域设置了三讲座制,从数量上看,比东京帝大增设了一个讲座,它表现出京都帝大从一开始就对东洋史学的发展寄予了很高的期待。最初的东洋史学第一讲座由内藤湖南主持,讲授中国历史文化;第二讲座桑原隲藏主持,讲授东西交涉史等;第三讲座矢野仁一和羽田亨共同承担,讲授朝鲜史、塞外史以及中西交涉史。在内藤湖南、桑原隲藏、羽田亨等教授开创的学术环境熏陶下,京都大学如同东京大学一样,先后培养出几代著名学者。这些学者有宫琦市定、安部健夫、那波利贞、田村实造、爱宕松男、曾

① 潮本守一《京都帝国大学の挑戦》,第 10—12 页;讲谈社 1997 年。

② 参照砺波护、藤井让治编《京大東洋学の百年》前言,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 2002 年。

我部静雄、藤枝晃、宇都宫清吉、岛田虔次、佐伯富、川胜义雄、谷川道雄、河内良弘、竺沙雅章、永田英正、吉川忠夫、梅原郁、砺波护、爱宕元、夫马进、杉山正明、富谷至、岩井茂树、吉本道雅等。他们共同构建了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的繁荣与辉煌。

20世纪初,日本政府除去东京帝大和京都帝大之外,还陆续在北至北海道,南至九州,建立了北海道帝国大学、东北帝国大学、名古屋帝国大学、大阪帝国大学、九州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的发展随着七所帝国大学的设置逐渐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侧重不一的学术重镇。

东北帝国大学建立于1907年,东洋史学是1924年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冈崎文夫(京都帝大毕业)担任当时法文学部史学第二讲座时开始的。1931年唐宋财政史、法制史专家曾我部静雄(京都帝大毕业)就任东北大学东洋史学第四讲座教授;此前,冈崎文夫与东北大学讲授中国文学的青木正儿(京都帝大毕业,日本学士院院士)、讲授中国哲学的武内义雄(京都帝大毕业、日本学士院院士)一起建立了“东北中国学会”,为东北大学的中国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949年,日本契丹史研究重量级的专家爱宕松男(京都帝大毕业)就任东北大学。爱宕松男的博士论文《契丹古代史研究》曾被京都大学田村实造教授称之为“在契丹史研究上建筑了一座金字塔”。50年代以后,先后执教东北大学的还有佐藤圭四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寺田隆信、安田二郎、熊本崇等教授。

九州帝国大学建立于1911年,东洋史学讲座的开设于1927年,首任教授是重松俊章。重松1913年毕业于东京帝大,研究领域为西域史和中国古代民俗学。1935年九州帝大东洋史迎来了又一位毕业于东京帝大的日野开三郎,日野研究重点在于唐宋社会经济史方面,1980年《日野开三郎东洋史论集》20卷的出版,记录了日野毕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此后在九大东洋史讲座先后执教的还有铃木俊(东京帝大毕业)、中村治兵卫(东京帝大毕业)、江岛寿雄、越智重明、船木胜马、川本芳昭、中岛乐章、船田善等教授。

北海道帝国大学建立于1918年,1947年设置法文学部后,开始有了东洋史学课程。首任教授是板野长八(东京帝大毕业),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其次是藤井宏(东京帝大毕业),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当时还有讲授北亚史的护雅夫(东京帝大毕业)。1949年,从事明代史研究的佐久间重男(东京帝大毕业),赴任北海道大学教养学部。1950年,随着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的独立,东洋史学讲座正式形成。1962年文学部史学科经历了再次整合,东洋史采用二讲座制。第一讲座中国史;第二讲座塞外史。50年代末期以来,先后执教的有本田实信、池田温、武田幸男、菊池英夫、滨岛敦俊、中井英基、菊池俊彦、津田芳郎、川合安、三

木聪等教授。

大阪帝国大学建立于1931年,东洋史学讲座的设置是在战败取消帝制后的1949年5月,首任教授桑田六郎(东京帝大毕业),此前他是旧台北帝国大学的教授,研究领域为东西交涉史和东南亚史。50年代期间在大阪大学执教的还有守屋美都雄(东京帝大毕业),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史;山田信夫(东京帝大毕业),研究领域为北亚史和中亚史;60年代以来,先后在大阪大学讲授东洋史学的还有杉本宪司、潮田富贵藏、布目潮汎、间野英二、斯波义信、中村哲夫、本田治、谷口规矩雄、森安孝夫、滨岛敦俊、片山刚、桃木至朗、荒川正晴等教授。

名古屋帝国大学建立于1939年,是日本建立的最后一所帝国大学。1948年该大学设置文学部以后,宇都宫清吉(京都帝大毕业)为东洋史讲座的首任教授,其后波多野善大(京都帝大毕业)、谷川道雄、森正夫、重松伸司等相继执教于名古屋大学东洋史,形成了日本史学界的又一重镇。现在名古屋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有江村治树、井上进;东南亚史教授有加藤久美子、林谦一郎等。

此外,在日本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还设有两个重要的学术机构,这就是著名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29年日本外务省成立了以研究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学术机构东方文化学院。下设东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1938年4月东方文化学院改组,京都研究所独立为东方文化研究所,以后经过发展整合形成了现在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研究所则成为(新)东方文化学院,后合并到1941年建立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这两个研究机构不仅拥有一流的研究设备与文献资料,还拥有一流的学术研究人才。例如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历代成员中有仁井田陞、江上波夫、关野雄、山本达郎、周藤吉之、米泽嘉圃、镰田茂雄、西嶋定生、蜂屋邦夫、铃木敬、斯波义信、池田温、松丸道雄、田仲一成、滨下武志、羽田正等。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历代成员中有安部健夫、贝塚茂树、塚本善隆、森鹿三、藪内清、福永光司、藤枝晃、竹内实、山田庆儿、吉田光邦、梅原郁、砺波护、吉川忠夫、狭间直树、森时彦、岩井茂树、高田时雄、富谷至、金文京、曾布川宽、田中淡等。

这两个研究机构在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均做出了卓越的成就。特别是他们设置的各类共同研究班,更值得中国学者关注与借鉴。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自1949年以来,截止到2000年,先后设置过100余个共同研究班。如藪内清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班(1949—1957);岩村忍的“元典章”研究班(1950—1969);森鹿三的“居延汉简的研究”班(1951—1956);贝塚茂树的“史记六国表的研究”班(1954—1956)和“两周金文编年的研究”

班(1956—1960);岛田虔次的“嘉靖万历时代的研究”班(1968—1971)等。砺波护在《京洛的学风》一书中,介绍了他从研究生阶段以来参加过京大人文研的八个共同研究班,即塚本善隆的“弘明集研究”班(1960—1970);森鹿三的“魏晋南北朝地方制度研究”班(1957—1964);宫崎市定的“雍正硃批谕旨研究”班(1949—1971);平岗武夫的“白氏文集校订”班(1963—1973);田中谦二的“元曲研究”班(1961—1969);日比野丈夫的“中国金石资料的研究”班(1968—1970),还有藤枝晃的“敦煌写本的会读”(当时还不是正式的研究班,研究班的名字是“敦煌写本的研究”,1970—1975)等。可以想象对于一位刚刚走进学术领域的年轻人来说,能够马上置身于这些著名学者主持的各种研究班活动之中,对其学术素质的养成具有何等的重要意义。日本的共同研究班是一种自由组成的课题研究班,一般设置五年左右,隔周活动一次,其成员来自各个大学。研究班结束时将其研究成果集结出版,本书就收录有一批这样的论文集。这种跨校级的共同研究方式,是一种促进学术交流、依靠集体的智慧研读史料、拾遗补阙、拔高研究水平的有效方法。在完善研究者个人的知识结构、提高科研素养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2009年11月5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庆祝建所80周年,专门举行了题为“共同研究的可能性——人文研80年的回顾与展望”的学术研讨会,很显然,共同研究的方式在京大人文研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

同样,东京大学的东洋文化研究所在战后50年代初整顿研究体制的同时,各个研究领域也设置了名目不同的共同研究班。与中国史相关的有仁井田陞、周藤吉之、西嶋定生、松本善海为中心的“中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展开”;还有仁井田陞的“中国的行会及家族”;植田捷雄的“东洋的近代化与国际关系”;江上波夫、山本达郎的“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米泽嘉圃的“中国绘画的特质”等研究班。在“中国国家结构与土地制度的历史展开”为课题的共同研究班,先后完成了松丸道雄、关野雄的“殷周春秋战国的国家结构研究”;西嶋定生的“秦汉帝国国家结构、豪族大土地所有制研究”;仁井田陞、山本达郎、松本善海、西嶋定生的“从曹魏屯田到均田制崩溃的土地制度研究”;堀敏一、西川正夫的“唐宋国家制度研究”;周藤吉之、仁井田陞、柳田节子的“宋代大土地所有制形成、庄园经营佃户及其农奴化研究”等项目;60年代后,中国史研究班分为唐以前和宋以后两大研究班,其中有松丸道雄的“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综合研究”班;池田温的“东亚诸国律令制的比较史研究”班;滨下武志的“十七世纪以来东亚公私文书的综合研究”班等。正是基于上述共同研究活动的基础,东洋文化研究所先后推出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例如仁井田陞的《中国的农村家族》,周藤吉之的《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

研究》，田仲一成《中国祭祀演剧研究》等。<sup>①</sup>

综上所述，20世纪日本中国史研究随着七所帝国大学的建立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大批专业人才又将各自的学术传承带到了全国各地的大学，并因此形成了各地规模不等的研究基地。如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お茶の水女子大学、筑波大学、中央大学、东海大学、关西大学、大阪市立大学、龙谷大学、立命馆大学、京都女子大学、广岛大学等高校都有重量级的学术领军人物与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问世，他们在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地位与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

### 三 本书收录著作目录范围

本书总共收录了20世纪初期以来截止到2010年的1200余部有关中国上古时期至清末的学术著作要目。在选择收录论著方面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著作的学术影响；在确定所选书目之前，笔者阅读了大量发表在《东洋史研究》、《史林》、《史学杂志》等学术刊物上的有关书评，并就有关选书征求了京都大学等高校学者及师友的意见；二、出版机构的学术知名度，如京都大学出版会、东洋文库、东京大学出版会、岩波书店、同朋舍、吉川弘文馆、汲古书院这些在学术界享有一定声誉的出版单位；三、国内学者的研究需求，如中亚史方面的成果收录既是如此；四、此前国内不太了解的研究领域成果（包括介绍日本学界最新动态）；五、新课题方面的研究成果等。

从内容上看，所选著作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1.古代历史分期及历史研究理论；2.古代律令及制度；3.古代社会经济史；4.古代社会文化思想史（包括宗族史）；5.古代科学技术史；6.敦煌学；7.中西交涉史；8.西北边疆史（中亚史）；9.蒙元史、满蒙史；10.古代宗教史；11.文物考古；12.古代音乐服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收录的论著中也有一些超脱以上范围者，这是因为受到收录著作的体例所限，如在全集类、系列丛书著作中都有这样的问题。为了方便读者能了解原著的全貌，在编排取舍上虽然做了一定的调整，但仍保留了其中的主要章目。

从收录著作的类型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I 个人学术著作类：

佐藤长著《古代西藏史研究》、藤川正数著《魏晋时代丧服礼的研究》；

<sup>①</sup> 参照《东京大学百年史 部局史四》，1987年东京大学出版。